

他因滑稽出名，却绝非仅仅因滑稽被后世称道

不是寿光人，为何寿光有东方朔的墓和祠？

□张书功

寿光为何有东方朔墓

东方朔，复姓东方，名朔，字曼倩，西汉平原厌次（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）人。今神头镇西二里有东方朔墓，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镇内原有东方朔祠，日伪时期毁于战火。2002年春，在神头镇附近发现了唐东方合墓，出土墓志铭。墓志铭记载：东方合是唐初德州安德（今陵城区）人，是汉大夫东方朔的第二十八代孙。其第二十五代孙为东方膺，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（506—511）任青州长史；第二十六代孙为东方老，北齐时任特进大夫，后迁济州、益州、南兖州刺史；第二十七代孙为东方荣，隋朝时官任右武卫长史。东方合墓志的出土，说明直到东方朔的第二十八代孙还生活在今陵城区一带。

东方朔虽不是寿光人，但寿光却有他的墓和祭祀他的祠。现存最早的山东地方志、元代益都人（今青州）于钦著《齐乘》中说：“寿光县东方村有东方朔庙”。清康熙安致远纂修《寿光县志》卷十四《塚墓考》云：“东方朔墓在县城东南十五里，弥水之东，东方朔庙侧。”并按云：“朔为平原厌次人，今德州域内有祠、有墓，而于钦《齐乘》言寿光东方村有东方朔庙，意后人因庙而更为之墓耶。”安致远认为寿光东方朔墓是因庙（祠）而建，这个解释有道理，但不够深刻。

要解释这个问题，还得从东方村说起。不过，东方村何时立村，村名由来，均不可考。今村中没有姓东方者，也没有人记得有姓东方者。村西北有龙兴寺遗址，与东方朔祠只数十步之遥，遗址尚存元代重修龙兴寺碑，碑云：“龙兴寺在县之东南十有五里，旧有石佛一座在焉，上有‘洛城县令李某同妻李氏布施’，考其年代，乃北魏时承明年所造。”“承明”是北魏孝文帝所用年号，这个年号仅用了六个月。公元476年，是北魏延兴六年，这一年六月，改元为承明元年。次年即改元为太和元年。由此可知，龙兴寺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北魏承明元年（476）。元碑碑阴已有东方村，录村民40人，但不见东方氏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龙兴寺遗址还出土过一块碑，纪年残缺，上有“征虏将军”字样，从书法风格和内容看应是南北朝碑刻。碑阴录有一位名叫“东方生”的人，可知南北朝时期，确有东方氏定居于此，故东方村应以姓立村。据《风俗通》记载，伏羲氏“出于震，位主东方”，子孙遂以东方为氏，但已无从查考。现在所知道的姓东方者，最早的就是西汉大夫东方朔。后代以东方为姓，奉其为始祖。由东方合墓志可知，唐代时，东方氏已成为当地的大姓望族之一，可以说东方朔的家乡平原厌次（今德州陵城区神头镇）就是东方氏的郡望。

那么，东方氏是何时迁来寿光的呢？西晋永嘉之乱后，北方人口大量南迁，为了安置庞大的移民，东晋南朝政府在新的南迁之地，设置新的州、郡、县三级政府，

寿光市纪台镇东方村村后有东方朔墓、东方朔祠，东方朔被乡人尊为“朔爷”，所以东方朔祠在乡人口中又叫“朔爷庙”。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三到二十五是东方村赶会的日子，有叫它“东方庙会”的，有叫它“朔爷庙会”的，叫法不一样，目的都一样，都是为了纪念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西汉时期平原厌次（今山东德州陵城区神头镇）人，寿光却有他的墓和祠，这是为什么？东方朔当官虽不大，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，却屡屡被世人称道，其中原因又是什么？



摄于1958年的寿光东方朔祠，今已被毁。

仍用北方老家的名字命名地名，并且侨民另立白籍，减免租赋，这就是侨州郡县制度。元嘉初年（约424），刘义隆在千乘故地侨置乐陵郡，下辖阳信、乐陵、厌次、新乐、湿沃五县。侨置的乐陵郡属县，已知新乐、湿沃都在寿光，厌次确址虽无考，应距寿光不远。黄河以南青州落入北魏后，仍沿袭刘宋旧制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：“青州乐陵郡，故千乘地，刘义隆置，魏因之。领县五：阳信、乐陵、厌次、新乐、湿沃。”

由厌次的侨置以及东方合墓记载东方膺北魏时任青州长史，可推断在永嘉之乱后，可能有一支东方氏迁居寿光，因姓立村，因村建庙，因庙起墓。这也是寿光东方朔祠、墓的由来。

寿光东方朔崇拜

寿光东方朔墓和祠始建时间已不可考。《齐乘》有载，说明不晚于元代。寿光人还把东方朔请进了乡贤祠，把他当作自己人世代享祭，这算是一份特殊的礼遇。千百年来，东方朔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地方，形成了丰富多彩、独具地域特色的东方朔文化。关于东方朔祠、墓的形成，虽无定论，民间传说却一直盛行。相传，东方朔在死之前告诉自己的两个儿子：“东方有块宝地。我死之后，不必厚葬，只要用铁链抬着我的棺材一直向东走，遇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跋涉不止。一直抬到‘三东’之地，铁链在哪里断了，就把我葬在那个地方。”东方朔去世后，他的两个儿子遵照遗嘱，抬着棺材向东走去。一天，两天……这天晚上，他们抬着先父的棺材来到寿光弥河东岸时，突然听到“嘎吱”一声，定睛一看，铁链断了。旋即狂风大作，沙土飞扬。第二天早晨风停后，棺材落地之处出现墓冢一座。

此地名东方村，位于弥河东岸，厌次东方，正是东方朔所言“三东”之地。他的两个儿子就此止步，化作两棵伟岸挺拔的白杨守护于墓旁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大白”“二白”。

清康熙年间，寿光知县刘有成游览东方朔祠，见“祠荒墓圯”，于是应百姓请求，对祠、墓进行了修葺，并亲书碑记，立碑于墓前。在碑文中，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土人觊觎东方朔祠前的两棵大树，打算第二天砍伐。这一晚，寿光一个姓魏的乡绅梦见有两个童子，自称是东方人，并诉说自己身处险境，希望予以施救。第二天，魏乡绅来到东方村，见有人正在砍伐东方朔祠旁的两棵树，顿时明白过来，于是花钱救下了它们。这两棵树就是百姓口中的“大白”“二白”。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，其用意是附加一些灵验、传奇的色彩，使人的内心有所敬畏，以起到保护古迹的目的。

民国时期，寿光的寺庙、道观多改为学校，与东方朔祠相伴的龙兴寺，是寿光东南一带第一等的大寺庙，曾经殿宇辉煌，但也没能例外。百姓毁其神像，办了一所



《晚笑堂画传》中的东方朔画像

县立高等小学校。而对于东方朔祠，百姓不仅予以保存，而且集资重修，数月完工，焕然一新。拔贡杨得标在《重修东方朔祠》中写道：“盖龙兴寺祀佛像，祈福田者崇之，文明增进，迷信破除，则天然淘汰矣。东方朔祠祀先哲，明世道者尊之，国体虽变，世局虽殊，高山景行之思无今昔，一也。”可见寿光官员、百姓对东方朔的厚爱。

可惜，“文革”时，东方朔祠被拆除，墓被铲平，就连两棵白杨树也未能幸免。今天的祠、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复建的。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五，是东方朔庙会。除寿光当地群众外，昌乐、青州、临朐、广饶等周边地区的善男信女们也会扶老携幼，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。起初，人们只是祭拜东方朔祠和墓，后来又逐渐增加了斗鸡、秧歌、高跷、舞狮子、民乐表演、物资交流等内容，时间也由一天延长至三天，逐渐形成了以纪念东方朔为主题的经济文化活动。

东方朔为何被世人称道

东方朔约出生于公元前161年，去世于公元前93年。其事迹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均有记载。汉武帝即位不久，面向天下招聘贤才。东方朔以三千片木简之奏章，引起汉武帝好奇，得以待诏公车。但是，这个职位薪水少，也见不到皇上。他又以无中生有，恐吓皇帝身边侏儒的方式，待诏金马门，得以亲近皇上。后因他在射覆（一种占卜猜物游戏）中的出色表现，担任常侍郎，得到皇上的宠幸。公元前138年，因劝阻汉武帝修建上林苑，虽未被采纳，仍被提拔为太中大夫。不久，因他醉酒在大殿上小便，犯下大不敬之罪，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，贬为庶人，令其在宦者署待诏。又因在汉武帝杀昭平君一事上，劝说其不要悲伤，注意身

体，复为中郎，一直到最后。

东方朔生性诙谐，言辞敏捷，滑稽多智，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，又能察言观色，直言切谏。曾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，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执法，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矫枉风化。又曾上书言治乱得失，陈农战强国之计，临终规劝武帝远离巧言谄媚之人。他死后，奇谈怪论加身，竟位列仙班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神仙，知名度远超政治家、文学家这些名号。

东方朔终其一生最高职务不过是一千石的太中大夫，未能立下青史留名的政治功绩，武帝也只以俳优视之，但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却总是受人青睐，被人高看一眼。褚少孙将其故事补入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更是为他单独列传，与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同等待遇，并用近8000字述其生平，赞其为“滑稽之雄”。西晋文学家夏侯湛作《东方朔画赞》，称其“雄节迈伦，高气盖世，可谓拔乎其萃，游方之外者。”唐代颜真卿亲书赞文，勒之贞珉，以垂永久。宋元符间，封“智辩侯”。民间以“智圣”誉之。相声界奉其为祖师爷。

东方朔现象所折射出的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，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道德之困。当面对正道本心与皇权威严的抉择时，有的人选择迎合君主，随波逐流；有的人选择坚守正道，逆流直谏；还有的则装聋作哑，见风使舵。迎合君主或装聋作哑违背正道本心，为君子所不齿；但逆流直谏常会付出惨重的代价，不仅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伸张，丢官舍命也只在倏忽之间。

汉武一朝，共任命了十三位宰相。据有人统计，三人被罢免，三人主动求死或被逼自杀，三人被处死或死于狱中，还有一人惊惧成病，发疯而死。善终者是石庆、公孙弘、田千秋。石庆以谨慎老成著称，执政期间基本装聋作哑，没有发表过有建树的言论，就是这样还经常受到汉武帝的谴责。公孙弘则一味地迎合武帝，他曾经与众公卿事先约定好上奏的事情及观点，但到了武帝面前，却违背之前的约定，顺从武帝的意思。汲黯因此讽刺他“齐人多诈而无情实。”田千秋是十三位宰相中的最后一位，晚年的汉武帝开始反思，下《轮台罪己诏》开展自我批评，国家政策由穷兵黩武式的建功立业，改为爱惜民力，重视农业生产。田千秋为人朴实敦厚，做了丞相也很安分，而且能力也一般，因此得以善终。由此可见，在汉武一朝做官真是高危职业。

东方朔虽然是个小官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自轻自贱，行为苟且，而是利用看似滑稽的行为和言论进行劝谏，在笑声中避免劳民伤财、国破家亡，为百姓和国家做了很多好事。相比于那些唯唯诺诺，看皇帝脸色行事的“大人物”，这种精神难道不可贵吗？所谓“大智之用，道固委蛇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，他被历代文人士大夫所赞扬，其用意正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出现一篇《滑稽列传》一样，既是感同身受的无奈表达，又是借此讽刺现实，感慨世风，其用意无疑是深远的。